

“出版”的词类问题与向心结构之争

——一项基于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的研究*

王仁强 杨 旭

提 要 在汉语语法学界,词类多功能观取得普遍认同,但“这本书的出版”这个经典例证所引发的有关向心结构是非之争却此起彼伏。以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为指导,基于国家语委语料库对“出版”进行使用模式调查,同时对汉语词类与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向心结构的理论地位进行探讨。研究发现,鉴于“出版”表指称的用法已有较高的个例频率和类型频率,概括词“出版”在现代汉语社群语言层面词库中兼属动词和名词,而非仅为动词;向心结构理论解释的是言语层面句法中的现象,“这本书的出版”整体是名词词组,其中的“出版”在言语层面句法中也是名词;所谓汉语“词类多功能观”之所以应该摒弃,是因为它存在偷换概念和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研究表明,兼顾的经典逻辑和模糊逻辑的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有助于解决现代汉语等分析语的词类难题。

关键词 汉语词类 兼类 “出版” 向心结构 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 模糊逻辑

○ 引 言

范畴化是语言学的核心问题,其中现代汉语、现代英语、汤加语等上千种分析语的词类范畴化更是成为哥德巴赫猜想式的老大难问题,近百年来不断引发激烈讨论,其争论的焦点则是如何解释概括词的语法多功能现象(Aarts 2007, Rijkhoff & van Lier 2013, Valera 2014, 2015, 郭锐 2002, 沈家煊 2009, 袁毓林 2010, 陆俭明 2013, 王仁强 2014, 王仁强、周瑜 2015)。

就现代汉语而言,主流的观点是:一方面承认概括词的语法多功能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又坚持兼类要尽可能少的“简约原则”。(朱德熙 1982:39, 郭锐 2002:101, 沈家煊 2009:4, 陆俭明 2013:57)其结果就是承认汉语词类存在多功能现象,即朱德熙所主张的“汉语词类与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1985:4),并且认为这是汉语有别于印欧语的重要特点。周初(2015)甚至主张摒弃兼类概念,以便更加彻底地贯彻朱先生的词类观。

以“这本书的出版”为例,主流的观点认为做主语是汉语动词的主要功能之一,因而该例中的“出版”仍然是动词。然而,这就导致汉语词类研究陷入两大困境:困境一,做到“词有定类”就“类无定职”,做到“类有定职”就“词无定类”;困境二,满足“简约原则”就违背“扩展规约”,满足“扩展规约”就违背“简约原则”(胡明扬 1996, 沈家煊 2009)。为了解决这两个困境,众学者提出了各种方案,但争论的焦点在于向心结构理论的是与非,因为“扩展规约”其实就是向心结构理论,主张“所成短语与其成分之一属于相同的形式类”(Bloomfield 1933:104~

* 本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超学科视域下的分析语词类问题实证研究”(编号:15BYY169)的资助。

105)。有维护派,如施关淦(1981、1988)、项梦冰(1991)、司富珍(2004)和黄和斌(2014)等;有修正派,如朱德熙(1984)、郭锐(2000)、王红旗(2013、2015)和周国光(2007、2016)等;还有否定派,如司富珍(2006)、石定栩(2007)和徐阳春、刘超宇、陈鑫(2017)等。“这本书的出版”中的“出版”具有名词性,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这能从构式压制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得到解释(李云靖 2008,沈家煊 2009,高航 2013)。但是,对于“出版”名词性的规约化程度却有不同意见。任鹰(2008)指出,名物化主要同语义模式(动作→事物)、表述功能(述谓→指称)转化有关,不一定非要有形式标志,“与其相对稳定的词类功能相比,词语的功能转化只是获得一种临时功能,应为词语的非常规用法”。黄和斌(2014)则从英汉对比的角度提出了不同意见:一方面,英语中也有很多词没有形态变化(即兼类词),我们不能放大两者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可以借鉴英语的做法,尝试把那些频率很低的名词用法也收入词典。王仁强(2010)则指出,只有把高频词“出版”在语言层面处理为动词兼名词才能同时满足“简约原则”和“扩展规约”。遗憾的是,他们都未对“出版”名词用法的规约化程度做出具体调查。

上述理论上的纷争在现代汉语词典词类标注和现代汉语语料库词性标注中也有反映。《现代汉语词典》(第5、6、7版)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1、2、3版)都把“出版”标注为动词,这无疑是“简约原则”的直接反映。然而,在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中,“出版”的词性标注却存在以下困惑:

1. 同样是做主宾语用法的“出版”,有的标注为动词,如例(1)和例(3),有的标注为名词,如例(2)和例(4):

(1)《/w 邓小平/nh 文选/n 》/w 的/u 出版/v, /w 是/vl 全/a 党/n 和/c 全国/n 人民/n 政治/n 生活/n 中/nd 的/u 一/m 件/q 大事/n。 /w

(2)林奈/nh 的/u 《/w 自然/n 系统/n 》/w 一/m 书/n 的/u 出版/n, /w 结束/v 了/u 过去/nt 对于/p 生物/n 种类/n 所/u 存在/v 的/u 混乱/a 现象/n。 /w

(3)列宁/nh 所/u 说/v 的/u “/w 写作/v 事业/n”/w 包括/v 理论/n、/w 宣传/v、/w 新闻/n、/w 出版/v 等/u 各方面/n 的/u 事业/n, /w 当然/d 也/d 包括/v 文学/n 事业/n。 /w

(4)其/r 主要/a 手段/n 有/v: /w 扩大/v 军费/n, /w 增加/v 赋税/n, /w 举/v 借/v 内外/nd 债/n, /w 充当/v 军火/n 买办/n, /w 垄断/v 全国/n 金融/n 及/c 工业/n、/w 商业/n、/w 农业/n 交通/n 运输/n 乃至/c 电影/n、/w 广播/n、/w 新闻/n 出版/n 等/u 文化事业/n。

2. “出版”与其同位语所标注的词性不同。比如,在例(5)中,处于同位语位置的“言论”和“集会”均标注为名词,而“出版”却标注为动词。同理,在例(3)中,处于同位语位置的“理论”和“新闻”均标注为名词,而“出版”却标注为动词。

(5)资本主义/n 法律/n 虽然/c 规定/v 了/u 公民/n 享有/v 言论/n、/w 出版/v、/w 集会/n 等/u 自由/a 权利/n, /w 但是/c, /w 这些/r 自由/n, /w 只/d 限于/v 在/p 有利于/v 资产阶级/n 统治/v 的/u 范围/n 内/nd。 /w

3. 同样是语素组用法,有的未标注词性,如例(6),有的却标注词性,如例(7):

(6)/w 原/a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ni 的/u 工作/n 移交/v 给/p 文化部/ni。 /w

(7) /w 国务院/ni 不/d 设立/v 人事部/ni、/w 法制/n 委员会/n、/w 扫除/v 文盲/n 工作/n 委员会/n、/w 出版/v 总署/n。 /w

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为指导,基于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对“出版”进行使用模式调查。通过调查其名词用法的规约化程度,确定概括词“出版”在现代汉语社群语言层面词库中的词类归属,同时澄清学界对向心结构理论的误解。

一 研究设计

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Two-level Word Class Categorization Theory)是针对现代汉语、现代英语等上千种分析语中概括词在社群语言层面词库中普遍存在的语法多功能性,根据词在言语层面不同句法位置上(即“个体词/word token”)和社群语言系统层面词库中(即“概括词/word type”)两种存在状态,基于近些年国际上涌现出的复杂适应系统语言观(Beckner *et al.* 2009)以及 Croft(1991)和 Croft & van Lier(2012)所主张的跨语言词类本质观而提出的一种词类范畴化理论新模型(Wang 2014)。该理论认为,分析语的词类范畴化在两个层面发生,即个体词的词类范畴化和概括词的词类范畴化;个体词的词类范畴化是说话者的命题言语行为(包括指称、陈述、修饰等)的表达过程,可通过个体词的句法功能与其意义事件(meaning events)或语境意义的关联标记模式进行判断;概括词的词类范畴化体现为一个言语社群集体无意识的自组织过程,其核心是规约化/相变;概括词的词类属性既非“先验存在”,也非“词无定类”,而是随着个体词在言语层面句法中(即各种命题言语行为构式中)反复使用而发生演变,概括词的语法多功能/兼类与使用频率(含个例频率和类型频率)密切相关;概括词的词类归属(单类或兼类)是其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s),是其在言语层面句法中所体现出来的规约性命题言语行为模式,需要描写语言学家基于语料库使用模式调查,抽样分析有关个体词在言语层面句法中的命题言语行为功能,并根据其命题言语行为模式的规约化程度有意识地实施的范畴化过程,其中语文词典编纂中的词类标注就是典型代表。

针对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已开展了多项实证研究。王仁强(2013、2014)基于《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和《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7版)两个词类标注数据库的大数据研究表明:兼类是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等分析语中概括词在社群语言层面词库中的共性特征,但是现代汉语词典所展现的汉语兼类词比例大约只有现代英语的一半,现代汉语词典明显遵循“简约原则”,存在人为减少兼类的现象。王仁强、周瑜(2015)通过严格的实证研究发现,现代汉语兼类与词频成正相关,同时证明“简约原则”不可行。王仁强、陈和敏(2014)以英语 sneeze 及物动词用法的规约化为例,基于语料库探讨了动词与构式的关系,同时提出了规约化的判断标准。Wang & Huang(2015)在“第29届亚太语言信息与计算会议”(PACLIC 29)上所做的大会特邀报告中探讨了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对现代汉语语料库词性标注的启示。上述研究无疑证明,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于是,我们选取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简称“语委语料库”)对“出版”的用法进行检索和分析。根据王仁强、陈和敏(2014)所提出的规约化标准,从个例频率和类型频率两方面对其用法的规约化程度进行分析。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首先区分开“出版”的词用法和构词用法(语素组用法),然后分析作为词的“出版”在句法中的命题言语行为功能,分别标注为陈述、指称、修饰,最后针对“出版”词用法中的指称用法,统计出其个例频率和类型频率,以期对其指称用法的规约化程度做出判断。

二 调查结果

2.1 个例频率

经过检索,“出版”在“语委语料库”中共有 1573 条索引,有 1 条不合格索引(即“一方面体现出版画在黑白转换上……”),有效率为 99.94%。鉴于其总数不多,我们进行全样本分析。其中“出版”的词用法共有 1319 例,占 83.91%;语素组用法的有 253 例,占 16.09%。

在“出版”为词的命题言语行为模式中,陈述用法居首,共有 1170 例,占总数的 88.70%。其次是指称用法,共有 149 例,占总数的 11.39%。

2.2 类型频率

如表一所示,“出版”的指称用法不仅出现在“NP+的+出版”的结构中,还出现在“Adj+出版”“出版+的+NP”、并列等结构中。其中“NP+的+出版”居首,共 81 例,占总数的 54.36%;其次是“Adj+出版”“出版+的+NP”“并列”,分别是 22 例、17 例和 15 例,占总数的 14.77%、11.41%、10.08%。进一步调查与“出版”的搭配,发现在各个结构中搭配的词汇类型多样。

表一 “出版”的指称用法在各类结构中的分布情况

	数 量	比例(%)	搭 配
NP + 的 + 出版	81	54.36	[图书]
Adj + 出版	22	14.77	电子(21)、迅速(1)
出版 + 的 + NP	17	11.41	技术现代化、可能性、立法、事、自由;方面、管理 条理、管理、活动、管理规定、成就展
并列	15	10.08	整理、研究、制作、发行、复制、编辑、印刷、校 对、编写
VP + 出版	5	3.36	等于、搞、从事
出版 + VP	4	2.68	发达、困难、有利于……、电子化
其他	3	2.01	以……为例;在……之外;在……前
合计	149	100	

注:“[图书]”表示属于图书一类的词。

三 讨论

3.1 概括词“出版”的词类归属问题

基于“语委语料库”的调查表明,做主宾语表指称命题言语行为功能的“出版”既具有较高的个例频率,又具有很高的类型频率(出现在 7 类句法环境中,每种结构搭配的词语都很多样)。鉴于语言是动态开放的复杂适应系统(Beckner *et al.* 2009, Kretzschmar 2015),根据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出版”表达指称的名词用法已经具有很高的规约化程度,概括词“出版”在汉语社群语言层面词库中兼属动词和名词,大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应该把“出版”处理为动名兼类词。根据国家语委 2008 年发布的《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草案),概括词“出版”是一个 1000 以内的超高频词(频序:825)。鉴于现代汉语兼类与词频呈正相关(王仁强、周瑜 2015),超高

频的概括词“出版”在汉语社群语言层面词库中具有兼类属性就不足为怪了。

3.2 向心结构理论的是与非

根据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这本书的出版”中的“出版”表达指称,是言语层面句法中个体词的名词用法。这种表述与向心结构理论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为什么不少学者不认可概括词“出版”是动名兼类词以致否认向心结构理论呢?

近百年来,围绕缺少形态标记的分析语所存在的词类活用(lexical flexibility)或词无定类(precategoriality)的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Rijkhoff & van Lier 2013, Van Lier 2017)。国内学者在处理兼类词问题时,同样追求抽象的单义,以追求兼类要少的“简约原则”(吕叔湘、朱德熙 1951, 吕叔湘 1979, 朱德熙 1982、1985, 陆俭明 1994、2013, 郭锐 2002, 沈家煊 2009、2012、2015)。就分析语而言,词类的问题主要是兼类词问题,而兼类词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呢?正如梁丹丹、封世文(2006)所言,兼类词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处理词的同一性问题,而同一性问题依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Robins(1989:182)指出,搞生成语法研究的学者倾向于使用syntax(句法)来涵盖词项内部语素之间的关系和构式中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其理论模型中的名词、动词等句法范畴或语类(syntactic categories)实际上抹杀了概括词和个体词的词类区分。难怪坚持生成语言学思想的学者会认为,词库中的词类不完全赋值(即实词词无定类),一个词的词类属性是在句法使用中显现出来的(Chomsky 1970, Halle & Marantz 1993, Marantz 1997, Brattico 2005, 林巧莉、韩景泉 2011, Bisang 2013)。我们认为,这与黎锦熙(1924:6)提出的“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并无二致,尽管他在该书 1951 年再版序言中更正了“离句无品”之说。正如 Hanks(2013:415)所言,20 世纪下半叶有关句法和语义的许多语言学理论都迷失了焦点,其中包括忽视对词库进行深究。言语层面句法中的词只是个体词,并不等同于社群语言层面词库中的概括词。Wetzel(2009)指出,概括词和个体词的区分对于语言学理论研究至关重要。相应地,我们认为,区分概括词的词类范畴化和个体词的词类范畴化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我们发现,许多有关词类灵活性的争论实际上都是由于偷换概念、以偏概全所致。在词类范畴化研究中,研究者无疑要使用“语言”“词库”“词”“意义”和“词类”5 个术语,但是这 5 个术语其实都是多义词,研究者在论述中很容易有意无意地偷换概念,以偏概全。陆俭明(2013:35)指出:“汉语词类问题之所以成为老大难问题,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许多人没有深刻认识到,词类是概括词的分类,而不是个体词的分类。”概括词是个体词的抽象和综合,是具体的言语片段以外的东西。换言之,概括词是社群语言系统层面词库中的词,相当于语文词典中收录的词条(Carstairs-McCarthy 2002:6, Leech 2006:126),而个体词是言语层面句法位置上的词。形式逻辑的“同一律”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必须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概念和判断,不能混淆不相同的概念和判断。但是,问题恰恰就出在不少学者在对“同一意义”的把握上出现了“偷换概念”、违背“同一律”的情况。正如 Hanks(2013:73)所言,人们在说“意义”的时候,容易把“意义事件”等同于“意义潜势”。其实,孤立的词(如词典的词目)只有“意义潜势”,而使用中的词才真正具有“意义”。一个概括词的意义潜势可以包括多个意义成分(相当于多个义项),在不同的语境中激活不同的意义成分。对于许多概括词而言,其意义潜势中只有一个在认知上比较凸显,而且常常就是人们在说某个词的“意义”时的所指对象。意义潜势的某些意义成分之间甚至可以是相互冲突的。由此观之,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只适用于言语层面句法中个体词之间的“意义”是否相同。由于词既存在于言语层面具体的句法位置上,又存在

于抽象的社群语言层面词库中,词的同一性问题让词类范畴化的研究者伤透脑筋。陆俭明(2013:36)指出,“由个体词概括为概括词,所遵循的原则是‘同音同义’的同一性原则”。不过,社群语言层面的词库(即语文词典)中概括词的典型特征是多义性,尤其是常用词,容易衍生功能多义性并发展成为兼类词。然而,为了保持所谓理论上的一致性,多数学者选择削足适履,在对概括词的词类区分中尽量遵循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但是,其代价是惨重的。胡明扬(1996:3)认为:“兼类问题的处理往往牵涉到整个词类体系,难度较大,所以成为在词类问题上争议的焦点就绝非偶然了。”Croft(2000:67~72)指出,Hengeveld(1992)针对不同语言在词类判断上采用了双重标准:对英语中所谓灵活词的多功能用法采取句法功能标准判断其词类,而对汉语、克丘亚语(Quechua)等其他分析语的词类分析则采取了意义标准辅之以形态标准(其中意义标准起决定性作用),采取合并法(lumping approach),即忽略一个概括词用于不同句法功能时词义可能发生规约性变化这样的语言使用事实,把本来的多义现象高度抽象为单义,以为这样可以满足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既然是单义词,自然就是单类词,其代价就是这个单类词的语法功能异常灵活。我们认为,词类多功能观其实就源于此。如果严格采用意义标准,英语中 take a walk, have a talk 中的“walk”和“talk”也是动词,而非名词(Dixon 2005:460)。我们认为,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悖论,不少学者认为汉语突破了“扩展规约”,先验地认为“出版”是一个多功能的动词(沈家煊 2009,王红旗 2015)。

毋庸置疑,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有关“词类”的术语使用。英语中“parts of speech”“word classes”“form classes”“lexical categories”“grammatical categories”和“syntactic categories”等术语在有关名词、动词等“词类”的讨论中常常交替使用,有时真让人不清楚究竟这些术语是指称不同的范畴呢,抑或是大致同义的(Rauh 2010:1~3)。其中,“syntactic categories”通常用于生成语法研究中,通常译为“语类”,既包括“名词”“动词”这样的词汇范畴/词汇语类(lexical categories),也包括名词词组、动词词组这样的短语范畴/短语语类。Croft 在其专著 *Syntactic Categories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The Cognitiv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1991) 中,探讨的也是言语层面句法中的词类范畴化问题,而非社群语言层面词库中的词类范畴化。林巧莉和韩景泉(2011)采用“分布形态理论”(Distributed Morphology)对汉语词类问题进行了研究,但该文否认汉语在社群语言层面词库中存在词类,其中把词类等同于语类(即词层面的语类)的做法也存在偷换概念:他们只认可言语层面句法中的词类/语类,而他们在讨论中所用的“语言”实际上指(理想化的)个人语言而非社群语言。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属于典型的混淆了语言的社会属性和语言的心理属性(参见 Itkonen 2005:221)。

有的学者虽然提出区分词汇(即词库)层面和句法层面的词类属性,但没有厘清两者的关系。郭锐(2002:89~90)虽然也区分了现代汉语词汇层面的词性和句法层面的词性,但他认为,“词汇层面的词性就是词语固有的词性,需在词典中标明;句法层面的词性是词语在使用中产生的,需要句法规则控制”。这个观点也得到王红旗(2015)的认可。但是,鉴于语言是动态开放的复杂适应系统,根据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社群语言层面词库中概括词的词类属性既非“先验存在”,也非“词无定类”,而是随着个体词在言语层面句法位置上(即各种命题言语行为构式中)反复使用而发生演变,概括词的兼类与使用频率(含个例频率和类型频率)密切相关。

此外,以偏概全的主观臆断在词类范畴化研究中也比比皆是。比如,甲柏连孜(von der Gabelentz)早在 1878 年就指出,汉语中大多数词都可以兼属许多不同的词类(转引自 Bisang 2013:285)。Vogel(2005:67)指出,类似汉语这样的语言属于低语法化的语言,没有词类区

分,因为任何词都可以用于任何句法位置。沈家煊(2009:4)指出:“既然汉语里几乎所有的动词都可以出现在主宾语位置,那就只需将这一特性归为动词本身的特性,说动词变为名词完全是‘多此一举’,是无端增加一个步骤。”陆俭明(2013:6)以“研究”为例,认为“汉语里的动词可以做谓语、带宾语、带补语、做主语、做宾语、做定语”,以此说明汉语名词、动词、形容词进入句子无形态变化。Gil(2010:150~151)认为,“在雅加达印尼语中,几乎所有的词都具有相同的句法表现,尤其是指称事物的词和指称活动的词在句法行为上没有任何差异”。其实,上述主观论断都并非实证研究的结果。复杂适应系统语言观已经表明,语言知识是在使用中产生的(Beckner *et al.* 2009,Bybee 2010,Kretzschmar 2015),而且(社群语言层面词库中的)兼类与词频存在相关性(Robins 1989:213~214,王仁强 2014,王仁强、周瑜 2015)。

归根结底,我们认为,分析语的词类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根本原因在于误用了一阶(谓词)逻辑或曰经典逻辑。一阶逻辑是数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使用的一种形式演绎系统。Gershenson(2013:10)指出,“经典逻辑以及传统科学在研究封闭系统方面一直非常有效”。但是,对于语言这样的复杂适应系统,经典逻辑的局限性暴露无遗。Munné(2013)认为,模糊性是复杂系统的特征之一,采用模糊逻辑对语言复杂系统进行研究大大颠覆了长期统治西方学术思维的经典逻辑(即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一阶谓词逻辑);在语言复杂系统中,经典逻辑中的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纷纷失效或者受到限制。我们不妨以词类范畴化问题为例对此进行阐释:

A. 同一律失效。根据同一律,动词是动词,名词是名词,名词和动词词类不能出现交叉。如果一个概括词具有两种词类的功能,为了避免词类交叉(即兼类),要么把它处理为分属两种词类的两个同形概括词,要么把它处理为词类的多功能现象。我们认为主张兼类要少的“简约原则”正是基于同一律而提出的。但是,王仁强(2013)基于《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调查发现,该词典收录的现代汉语动名兼类词有1311条,王仁强(2014)基于《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7版)的调查发现,该词典收录的现代英语动名兼类词更是高达2643条,而本项调查发现,概括词“出版”理应处理为一个动名兼类词条。换言之,兼类是分析语的共性特征(Robins 1989:214)。

B. 矛盾律失效。根据矛盾律,“出版”要么是动词,要么不是动词,或者要么是名词,要么不是名词,如果处理为动名兼类词就违背了矛盾律。但是,根据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在“这本书的出版”中,个体词“出版”的命题言语行为功能表指称是名词,不是表陈述的动词,符合矛盾律;概括词“出版”的陈述用法和指称用法都已规约化,因而在社群语言层面词库中兼属动词和名词。这看似违背矛盾律,其实不然,因为“兼类是出现在不同时间或不同条件下的两种及两种以上使用模式的抽象和概括”。(王仁强、周瑜 2015:66)所谓遵循矛盾律以避免概括词兼类的做法其实是逻辑误用。

C. 排中律失效。根据排中律,一个个体词要么属于某个词类,要么不属于某个词类,没有其他可能性。但是,在“这本书的出版”中,个体词“出版”既有名词的语法功能和命题言语行为功能(即做主宾语表示指称),又有动词的概念语义(关于词类与词义之间存在本体论关联,参见Ježek 2016:102),排中律看似无效。不过,根据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这里的个体词“出版”根据其命题言语行为功能只能判断为名词,因为词类的本质是命题言语行为功能。

总之,正如一阶逻辑无法合理解释计算机科学中的参数多态(parametric polymorphism)和遗传学中的多态性(polymorphism)一样,一阶逻辑显然也无法合理解释社群语言层面词库

中概括词所体现的兼类现象(如概括词“出版”所体现的兼类),也无法合理解释言语层面句中个体词所体现的范畴模糊现象(如“这本书的出版”中个体词“出版”所体现的范畴模糊现象)。研究表明,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兼顾经典逻辑和模糊逻辑,有效区分了概括词和个体词不同的范畴化过程,对分析语的词类范畴化难题能够提供更加完整合理的解释。

四 结 论

综上所述,向心结构理论实际上是 Bloomfield(1933)针对言语层面句法所提出的理论,故以之判断社群语言层面词库中的语言现象是一种僭越。从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看,在言语层面句法中,“这本书的出版”符合向心结构,其中做主宾语表指称命题言语行为的个体词“出版”只是名词(符合经典逻辑),尽管它具有动词语义(符合模糊逻辑);而在社群语言层面词库中,除了表陈述的规约性动词用法之外,“出版”表指称的名词用法已经具有较高的类型频率和个例频率,说明它作为概括词兼属动词和名词(符合模糊逻辑)。有鉴于此,所谓汉语词类问题的两个困境完全是人为虚构出来的伪命题。具体而言,前人研究之所以出现争议,是因为存在偷换概念(以一阶逻辑看待社群语言层面词库中概括词的词类属性和言语层面句法中个体词的范畴模糊现象)和以偏概全(把少量高频概括词的多功能现象概括为整个汉语词汇都具有的多功能现象)。鉴于语言是开放动态的复杂适应系统,兼顾经典逻辑和模糊逻辑的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显然能够更好地解决现代汉语等分析语的词类范畴化问题。

参考文献

- 高 航 2013 《“N的V”结构的认知语法考察: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外文研究》第4期。
- 郭 锐 2002 《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胡明扬 1996 《现代汉语词类问题考察》,《词类问题考察》,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黄和斌 2014 《质疑“两个问题”与“一个难题”——对布氏向心结构观的认识》,《外国语》第4期。
- 黎锦熙 1924/1992 《新著国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云靖 2008 《“NP+的+VP”结构的构式语法阐释》,《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梁丹丹、封世文 2006 《再论兼类词处理——并以神经语言学研究为证据》,《江西社会科学》第10期。
- 林巧莉、韩景泉 2011 《从“分布形态理论”看汉语的词类》,《外国语》第2期。
- 陆俭明 1994 《关于词的兼类问题》,《中国语文》第1期。
- 陆俭明 2013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第4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朱德熙 1951 《语法修辞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 任 鹰 2008 《“这本书的出版”分析中的几个疑点——从“‘这本书的出版’与向心结构理论难题”说起》,《当代语言学》第4期。
- 沈家煊 2009 《我看汉语的词类》,《语言科学》第1期。
- 沈家煊 2012 《“名动词”的反思:问题和对策》,《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沈家煊 2015 《词类的类型学和汉语的词类》,《当代语言学》第2期。
- 施关淦 1981 《“这本书的出版”中“出版”的词性——从“向心结构”理论说起》,《中国语文通讯》第4期。
- 施关淦 1988 《现代汉语里的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中国语文》第4期。
- 石定栩 2007 《向心结构与离心结构新探》,《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
- 司富珍 2004 《中心语理论和汉语的DeP》,《当代语言学》第1期。
- 司富珍 2006 《中心语理论和“布龙菲尔德难题”——兼答周国光》,《当代语言学》第1期。

- 王红旗 2013 《向心结构的识别》,《语文研究》第1期。
- 王红旗 2015 《向心结构可以与其中心语属于不同形式类》,《语文研究》第1期。
- 王仁强 2010 《现代汉语词类体系效度研究——以〈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词类体系为例》,《外语教学与研究》第5期。
- 王仁强 2013 《现代汉语兼类问题研究——兼评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重要价值》,《外国语文》第1期。
- 王仁强 2014 《现代英语兼类现状研究——以〈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7版)为例》,《外国语》第4期。
- 王仁强、陈和敏 2014 《基于语料库的动词与构式关系研究——以 sneeze 及物动词用法的规约化为例》,《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
- 王仁强、周 瑜 2015 《现代汉语兼类与词频的相关性研究——兼评“简略原则”的效度》,《外国语文》第2期。
- 项梦冰 1991 《论“这本书的出版”中“出版”的词性——对汉语动词、形容词“名物化”问题的再认识》,《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徐阳春、刘超宇、陈 鑫 2017 《汉语“N的V”问题之症结与出路——兼论向心结构理论的先天不足》,《当代语言学》第2期。
- 袁毓林 2010 《汉语词类的认知研究和模糊划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周 初 2015 《兼类说反思》,《语言科学》第5期。
- 周国光 2007 《“NP+的+VP”结构和相关难题的破解》,《汉语学报》第3期。
- 周国光 2016 《向心结构难题专题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4 《关于向心结构的定义》,《中国语文》第6期。
- 朱德熙 1985 《语法答问》,北京:商务印书馆。
- Aarts, B. 2007. *Syntactic Gradience: The Nature of Grammatical Indetermin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ckner, C., et al. 2009. Language i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Position paper. *Language learning* 59 (s1):1-26.
- Bisang, W. 2013. Word-class systems between flexibility and rigidity: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In J. Rijkhoff & E. van Lier. *Flexible Word Classes: Typological Studies of Underspecified Parts of Spee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loomfield, L. 1933. *Languag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Brattico, P. A. 2005. Category-free model of Finnish derivational morphology. *SKY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8: 7-45.
- Bybee, J. 2010. *Language, Usage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rstairs-McCarthy, A. 2002.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Morphology: Words and Their Structu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Chomsky, N. 1970. Remarks on nominalization. In R. A. Jacobs & P. S. Rosenbaum. *Readings in English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Croft, W. 1991. *Syntactic Categories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The Cognitiv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roft, W. 2000. Parts of speech as typological universals and as language particular categories. In P. M. Vogel & B. Comrie. *Approaches to the Typology of Word Classe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Croft, W. & E. van Lier. 2012. Language universals without universal categories.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1-2: 57-72.
- Dixon, R. M. 2005. *A Semantic Approach to English Gram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rshenson, C. 2013. Facing complexity: Prediction vs. adaptation. In À. Massip-Bonet & A. Bastardas-Boada. *Complexity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Berlin: Springer.
- Gil, D. 2010. The acquisition of syntactic categories in Jakarta Indonesian. In U. Ansaldi, J. Don & R. Pfau. *Parts of Speech: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Advances*. Amsterdam: Elsevier.
- Halle, M. & A. Marantz. 1993. Distributed morphology and the pieces of inflection. In K. Hale & S. J. Keyser.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Hanks, P. 2013. *Lexical Analysis: Norms and Exploitation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Hengeveld, K. 1992. *Non-verbal Predication: Theory, Typology, Diachron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Itkonen, E. 2005. Concerning the synthesis between intuition-based study of norms and observation-based study of corpora. *SKY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8: 357-377.
- Ježek, E. 2016. *The Lexicon: An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retschmar, W. A., Jr. 2015. *Language and Complex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ech, G. 2006. *A Glossary of English Gramma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Marantz, A. 1997. No escape from syntax; don't try morphological analysis in the privacy of your own lexicon. In A. Dimitriadis, L. Siegel, C. Surek-Clark & A. William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4: *Proceedings of 21st Annual Penn Linguistics Colloquium*, 201-225.
- Munné, F. 2013. The fuzzy complexity of language. In À. Massip-Bonet & A. Bastardas-Boada. *Complexity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Berlin: Springer.
- Rauh, G. 2010. *Syntactic Categories: Their Identification and Description in Linguistic Theo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jkhoff, J. & E. van Lier. 2013. *Flexible Word Classes: Typological Studies of Underspecified Parts of Spee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bins, R. H. 1989. *Gener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ory Survey*. London: Longman.
- Valera, S. 2014. Conversion. In R. Lieber & P. Stekau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Derivational Morp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lera, S. 2015. Conversion. In Peter O. Müller (ed.). *Word-formation: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Volume 1)*.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Van Lier, E. 2017. Introduction: Lexical Flexibility in Oceanic Languages. *Studies in Language* 41(2): 241-254.
- Vogel, P. M. 2005. Conversion and derivation in different part-of-speech systems. In C. Knobloch & B. Schaefer. *Wortarten und Grammatikalisierung: Perspektiven in System und Erwerb*.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Wang R. Q. & C. N. Huang. 2015. The Two-level Word Class Categorization Model in analytic languag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OS tagging in Modern Chinese corpora. In *Proceedings of the 29th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Language, 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 (October 30-November 1, 2015). Shangha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1-10. (<http://www.aclweb.org/anthology/Y/Y15/Y15-1001.pdf>)
- Wang R. Q. 2014. Two-level word class categorization in analytic languag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ultiple class membership in Modern Chinese and Modern English. In *Proceedings of the 3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German Linguistic Society* (March 5th-7th 2014). University of Marburg, Germany, 345-347.
- Wetzel, L. 2009. *Types and Tokens: On Abstract Object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王仁强 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 400031; 杨旭 复旦大学中文系 200433)

HANYU XUEBAO

CHINESE LINGUISTICS

November 2017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Shao, Jingmin, On the Types of Subjectivity and Paths of Subjectivization

Four issues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1) types of subjectivity; (2) lexical paths of subjectivization; (3) syntactic paths of subjectivization; and (4) the evolution of subjectivization.

Key words: types of subjectivity, paths of subjectivization, degree of subjectivity, evolution of subjectivity

Kuang, Pengfei, Categories and Functions of X in the Structure of “Verb + X + Temporal Quantity Component”

An X can be inserted in the “verb + temporal quantity component” structure to compose the “verb + X + time component” structure. X may have various forms, functions and features. But X is mainly adverbs, and sometimes conjunctions, verbs, pronouns, and quantifiers. X can be either a single component or a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components. Functionally, X can be connective markers, negative markers, subjective quantity markers, focus markers, non-reality category markers, style markers and so on. X may be either syntactic components or pragmatic components. The grammatical meaning of the structure of “verb + X + temporal quantity component”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at of “verb + temporal quantity component”.

Key words: temporal quantity component, constant, variable, pragmatic component

Gao, Zailan, On the Multifunctional Clause Marker “Zhīsuǒyǐ (之所以)”

“Zhīsuǒyǐ (之所以)” is a high-frequency function word in written Chinese. Traditionally, “zhīsuǒyǐ (之所以)” clause is considered as an apodosis clause, and “zhīsuǒyǐ (之所以)” a conjunction like “yīnwéi (因为)” and “suǒyǐ (所以)”. This paper firstly questions the view that “zhīsuǒyǐ (之所以)” is a conjunction. Then it argues that “zhīsuǒyǐ (之所以)” clause actually acts as a subject, a topic or an attributive of a sentence instead of an independent clause. And last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in modern Chinese “zhīsuǒyǐ (之所以)” is multifunctional. It functions as a nominal clause marker and an anaphora marker instead of conjunction. The function of “zhīsuǒyǐ (之所以)” in modern Chinese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Key words: zhīsuǒyǐ (之所以), conjunction, nominal clause marker, anaphora

Wang, Renqiang & Yang, Xu, The Word Class Problem of “Chūbǎn (出版)” and Debates over Endocentric Constructions: 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wo-level Word Class Categorization Theory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in Chinese grammar studies that Chinese word classes are multifunctional, but there have been heated debates over the validity of endocentric constructions sparked by the classic example of “zhè běn shū de chūbǎn (这本书的出版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wo-level Word Class Categorization

Theory,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conduct a usage pattern survey of “*chūbǎn* (出版)” on the basi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rpus, and to addr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word classes and syntactic functions as well as the theoretical status of endocentric constructions. The Two-level Word Class Categorization Theory, which combines fuzzy logic with classical logic, is proved to be effective in solving the word class problem in analytic languages like Modern Chinese.

Key words: Chinese word classes, heterosemy, *chūbǎn* (出版), endocentric constructions, Two-level Word Class Categorization Theory, fuzzy logic

Li, Zongjiang, Topic Markers in Modern Chinese and Their Evolution

“Topic” is a pragmatic concept. But since the founding of structural linguistics, people have mainly treated it as a structural component.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the discourse sense of “topic” and term the element marking a topic “topic marker”. Two kinds of topic markers and their evolution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1) the element used to introduce the topic, like “*yàoshuō* (要说)” in modern Chinese, known as the “topic introducing marker”; and (2) the element used to change a topic, like “*zàishuō* (再说)” in Modern Chinese, called “topic changing marker”.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topic marker, historical evolution

Jin, Guitao,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fier + Noun” Structure in Cantonese

In Cantonese, the “classifier + Noun” structure firstly appeared after a verb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referring to something indefinite. And it began to refer to something definite in 1840s. From the 1850s, it could also be used before a verb. The emergence of its definite usages is related to both its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the analogy of “*gè* (个) + Noun” structure.

Key words: Cantonese, “classifier + Noun” structure, definiteness

Lu, Guoyao,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A Vis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 serious problem facing present Chinese cultural and academic fields, including linguistics, is worshipping everything foreign, which is harmful to the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and should be demolished. The author proposed a “correlation between national power and academic influence” in 2005. Presently, the author has got an inspiration from the study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 and newly proposed a “theory of postponed cultural and academic prosperity”. China’s national power has increased greatly and it is high time for us to achieve cultural and academic prosperity. Chinese linguists should be independent and self-reliant, and stick to the principle of neither worshipping nor opposing everything foreign. Thus, the vision that Chinese linguistics is strongly positioned in world linguistics can be realized.

Key words: neither worshipping nor opposing everything foreign, correlation between national power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eory of postponed cultural and academic prosperity

Xing, Xiangdong, On the Drawing of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 in the Northwest Area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briefly the ideas of drawing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 in the Northwest Areas* and the related thoughts and practices. It includes the following points: (1) the selection of the investigating spots; (2) the design of the questionnaire and the principles of investigating items; and (3) the investigating systems and the drawing of the atlas.

Key words: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northwest, Chinese dialects, characteristics atlas, ideas of drawing